



■古代娱乐

苏州弹词

苏州弹词是以说唱相间的方式，用苏州方言表演的“小书”类曲艺说书形式，发源并流行于以苏州为中心的江苏东南部、浙江北部和上海等吴语方言区，大约形成于明末清初。由于和苏州评话同属说书行业，曾经拥有共同的行会组织，民间即习惯性地将其与苏州评话合称之为“苏州评弹”。

苏州弹词的表演通常以说为主，说中夹唱。唱时多用三弦或琵琶伴奏，说时也有采用醒木作为道具击节拢神的情形。演唱采用的音乐曲调为板腔体的说书调，即所谓“书调”。因流传中形成了诸多的音乐流派，故“书调”又被称之为“基本调”。早期演出多为一个男艺人弹拨三弦“单档”说唱，后来出现了两个人搭档的“双档”和三人搭档的“三个档”表演。

苏州弹词的艺术传统非常深厚，技艺十分发达。讲究“说噱弹唱”。“说”指叙说；“噱”指“放噱”即逗人发笑；“弹”指使用三弦或琵琶进行伴奏，既可自弹自唱，又可相互伴奏和烘托；“唱”指演唱。其中“说”的手段非常丰富，有叙述，有代言，也有说明与议论。艺人在长期的说唱表演中形成了诸如官白、私白、咕白、表白、衬白、托白等等功能各不相同的说表手法与技巧，既可表现人物的思想活动、内心独白和相互间的对话，又可以说书人的口吻进行叙述、解释和评议。艺人还借鉴昆曲和京剧等的科白手法，运用嗓音变化和形体动作及面部表情等来“说法中现身”，表情达意并塑造人物。在审美追求上，苏州弹词讲求“理、味、趣、细、技”。“理者，贯通也。味者，耐思也。趣者，解颐也。细者，典雅也。技者，工夫也”。

苏州弹词的节目以长篇为主，传统的代表性节目有《三笑》、《倭倭传》、《描金凤》、《白蛇传》、《玉蜻蜓》、《珍珠塔》等几十部。早期的著名艺人有清代的王周士、陈遇乾、毛萼岚、俞秀山、陆瑞廷、姚豫章、马如飞、赵湘舟和王石泉等。清末民初出现了大批女演员。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广播电台的兴起，苏州弹词进入鼎盛期，节目丰富，流派纷呈，以演唱的音乐风格区分，就有“沈（俭安）调”、“薛（筱卿）调”、“魏（钰卿）调”、“夏（荷生）调”、“周（玉泉）调”、“徐（云志）调”、“蒋（月泉）调”等十多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苏州弹词艺术经过艺人们自觉的整旧创新，艺术上有了很大的飞跃。新节目不断涌现，长篇有《白毛女》、《新儿女英雄传》、《李闯王》、《青春之歌》、《苦菜花》、《红岩》、《野火春风斗古城》、《红色的种子》、《江南红》、《夺印》、《李双双》等，中篇和常独立演出的“选回”有《老地保》、《厅堂夺子》、《玄都求雨》、《花厅评理》、《怒碰粮船》、《庵堂认母》和《一定要把淮河修好》、《海上英雄》、《芦苇青青》、《新琵琶行》、《白衣女冤》、《大脚皇后》等。

然而20世纪末期以来，苏州弹词听众锐减，书场萎缩，艺人大量流失，生存发展面临危机，亟待抢救和扶持。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曲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摘自《中华五千年》）

商水白帝村是宋将扎营遗址

白帝，实为白堤，是商水县邓城乡的一个古老村子。史书载有“泽西白堤阴寒光”，意思是指秦汉时期，大澗水在此多次决口，洪水卷起泥沙横流，处在泽西的地方不只遍地白沙，也堆起大大小小的沙丘，“白沙岗”、“白堤”等村就出现了不少洪水后形成的村庄。

在白帝这个荒沙之村，历史上曾是汉高祖刘邦聚义反秦盟誓之处。殊不知，它还是宋将杨文广南征前平南汉的兵营处。

秦始皇会稽巡视暴病崩殂后，秦二世胡亥被宰相李斯篡改秦王遗诏废太子扶苏而继位，大兴土木，建造秦陵，除广征天下民夫赴骊山服役外，并令诸郡县在押狱犯登记造册上报，除死囚外，一律押送陵地服役。沛郡奉令沛郡狱吏刘邦押解三百多沛狱犯人前赴骊山服役。众人一路奔波赶到阳城泽西白帝村，清点人数时犯人已

途中逃跑多个。刘邦认为秦政苛刻，服役者不被累死也被折磨死，能生还者怕是百无一人，难怪他们要早日逃去。自己即使到地方交差，也犯下失职之罪。于是，晚饭时，他令剩余的犯人一律解脱绳索，共饮斛酒。之后，刘邦说：人逃多数，罪在我身，去陵服役也是死，诸位就此散去，各奔生路吧，话后又安排每人带足粮米。众犯人惊诧，认为不如跟着刘邦闯荡天下，或许能有活路。于是，大伙异口同声要求刘邦领着大伙闯天下。刘邦认为形势所逼，只好如此，随后众议一番，即借沙岗盟誓聚义，举起反秦旗帜。刘邦推翻了秦朝，登上了皇位后，在白帝沙丘上竖立一巨石，上写“白帝盟誓地”，后被兵乱所毁。

白帝，又是北宋名将杨文广的兵营。赵匡胤率兵征战时招收杨家将归顺大宋，

不久令杨文广在白帝村东边一古刹大院驻扎。不巧，受山东渤海的辽兵包围，他们粮缺草尽，又无援兵。一日，饥饿的马匹竟争着啃食残墙砖缝上的填缝土，吃得津津有味。这一发现，官兵异之，遂取其尝食。他们惊喜地发现：这墙缝乃是用糯米与栗子面加水搅拌成的填缝土，众人遂扒了不少，人马吃个饱，然后借此发起突围，一举突破重围。

1959年，白帝村民在平整土地、改良土壤时，在古刹旧址出土了宋将驻军时遗留下来的一对青石旗夹（现存县文化馆）。

白帝，本是不起眼的小村落，也正因它曾是汉高祖刘邦率沛犯聚义盟誓地、北宋名将杨文广驻扎兵营处，其村名也就传得妇孺皆知了。

（张俊奇 朱红霞）

西河大鼓

西河大鼓是北方较为典范的鼓书暨鼓曲形式，普遍流行于河北境内并流传周边河南、山东、北京、天津和内蒙古及东北地区。在流传过程中曾有过“大鼓书”、“梅花调”、“西河调”、“河间大鼓”和“弦子鼓”等名称，20世纪20年代在天津被定名为“西河大鼓”，沿用至今。

历史溯源

西河大鼓由木板大鼓发展而来。在河北省，演唱西河大鼓较早且最有声望者首推马三峰。他是安新县段村人，被曲坛称西河大鼓的创始人之一。

据艺人传说，早年在河北省中部就流传着演员以小三弦自弹自唱的“弦子书”和演员只敲击鼓板演唱的“单鼓板”，至乾隆中期保定艺人刘传经、赵传璧、王路等，将弦子书与单鼓板结合在一起，搭伴演出，形成以演员敲击鼓板，由另一人弹小三弦伴奏的演出形式，形成早期的木板大鼓，成为深受群众欢迎的一种“说书”形式，很快在冀中地区得到普及。

至辛亥革命前后，由木板大鼓向西河大鼓的转变已然成熟，在农村以“赶庙会”的方式说唱中篇书为主，在河北省农村普遍流行，有部分艺人便进入城市谋生。与其发源地最近的城市便是天津，最早到天津的演员有张双来、焦永泉、焦永顺、张士德、张士泉、白文生、白文明等，当时尚无西河大鼓之名，仍沿用在农村的叫法称为“犁铧片”或“梅花调”，也有的就叫“说书”。1924年，易县的王凤咏在天津与刘宝全等名家合作，在写海报时，因天津已有金万昌演唱的梅花大鼓（也称“梅花调”），为区别起见定名为“西河大鼓”。因为这个曲种来自大清河、子牙河流域，天津人习惯称此两河为西河和下西河，故而得名。虽然这是在一个偶然的情况下定名，但由于它符合曲种的实际情况，而得到同行的认可，一直沿用至今。

西河大鼓进入天津后，最初在西城根儿一带“撂地说书”，后来移进草创时期的说书棚，多年来以书馆、茶社为主要演出场地，逐步发展成为说唱长篇书的形式，使许多演员在“书路”上不断提高，其唱腔反而放在次要地位，这样的结果，使一部分人弃唱改说，成为评书演员。这些人改说评书以后，仍以原来鼓书的“书路”进行表演，一般来说缺乏评书那种细腻的描绘、知识穿插和对书情书理的评论，但却能以情节紧凑为长，也能受到许多观众的欢迎，与评书形成平分秋色之势。

另一部分人则以演唱短段为主，参加

各种综合曲艺场演出，他们在原有的小段的基础上，又向当时流行的京韵大鼓等鼓曲学习，运用西河大鼓曲调，演唱固定的脚本，在唱腔上加以丰富，提高了演唱技艺，演出于综合曲艺场。

建国后大多数西河大鼓演员仍在茶社书馆以说长篇书为主，只是偶尔在参加各种会演时演唱短段曲目。

艺术特色

西河大鼓的唱腔音乐，是以冀中语音的自然声韵为基础，吸取某些民歌小调的音乐语汇发展而成的。在音乐结构形式上，约有30余种依附于主曲的乐曲和乐句的唱腔，分别归纳在三眼一板的头板一眼一板的二板和有板无眼的三板等三种板式中，在速度上都可作大幅度的伸缩，有的还派生出多种变格唱法，唱腔和谐流畅，生动活泼，似说似唱，易唱易懂。

西河大鼓情节曲折，语言生动，是我国优秀的民间艺术遗产。自诞生之日起就受到广大流行地群众的喜爱，出现过马瑞河、朱化麟、毛贲、王再堂等著名艺人，以及《响马传》、《呼家将》、《薛家将》、《刘公案》、《施公案》、《前后七国》、《小两口争灯》等经典节目。

但20世纪中后期以来，西河大鼓的传承与发展出现了空前的危机，创演凋零，传人断档，大有消亡的危险，亟待抢救和保护。

国家非常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2006年5月20日，该曲艺经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摘自《中华五千年》）



西华县发现破解柴窑之谜的线索

12月3日，周口市文物普查队会同西华县文物普查队在西华逍遥镇普查时，发现一处古遗址。该遗址的发现，为破解柴窑之谜提供了重要线索。

遗址位于西华县逍遥镇柴城村西南的岗地上，南临沙颍河，西距逍遥镇约2公里。遗址呈不规则形，东西较长约650米，南北宽约380米，时代跨越宋、元、明、清。遗址地势高低不平，为当地人取土时所致，地表散布有一些宋、元、明时期的瓷片、陶片、砖块、骨格等。经勘探调查发现，有墓葬、灰坑、窑址、道路等遗迹。普查人员还采集有青釉、白地黑花、黑釉、酱釉等瓷片。

据《西华县志记载》，柴城位于县城西44里，南靠沙河，西北有颍河环绕。《河南续通志》记载，在西华县西南四十五里，五代周世宗所建成，周世宗，名柴荣，后人遂称柴城。因沙、颍河屡次决口，淤积深厚，其城址已无法考查。

据西华党校王广民副校长介绍，此地为五代周世宗柴荣兄长柴茂的封地。柴茂为后周骠骑大将军，后周瓷窑总管。现周围柴湾等村居住有大量的柴姓村民。王校长本人在此处生活工作多年，对陶瓷文化很是喜爱，对柴窑之谜也深感兴趣，经常在此捡瓷片，发现不少红烧土块等。他经过多方查找资料，仔细研究自己捡到的瓷片，认为柴城就是五代时后周柴窑的所在地，并写有近万字的论文《柴窑新探》。市普查队专家小组对王校长捡到的大量瓷片进行了鉴定，瓷片多为青釉、白釉、黑釉、酱釉等瓷片，时代为五代、宋、元、明等，是否其中有柴窑还需进一步调查研究。柴城宋代遗址的发现，丰富了周口市宋、元、明时期的文化遗存，为破解千年柴窑之谜提供了线索。

（焦华中）

